

新民学会中的湖南第一师范学人与湖南建党实践

曾长秋¹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一百年前，新民学会发出了湖南建党先声。新民学会会员多为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的早期革命活动，与国内最早建党的6个地方几乎同时进行。一师学人投身五四运动，组织勤工俭学，创办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建团直至建党，这些活动在共产党的创建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新民学会 湖南第一师范 建党先驱

【中图分类号】:D26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21)04-0036-07

以湖南第一师范(以下简称“一师”)学人为主体的，于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岳麓山下的溁湾镇成立了新民学会。作为湖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团体，会员们认定了奋斗目标就努力前行。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友就以一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出发地，以新民学会为“国外开拓、国内发展”的联络平台，共同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问题。他们走出湖南到北京、上海，远涉重洋到法国、日本、南洋诸国，去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经历了近代湖南乃至全中国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

一、五四时期一师学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

五四时期是一个“群雄立党救中华”的年代，社团林立，政党蜂起，各种救国主张纷纷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可是，由于刚从国外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繁多，人们总是“隔着窗纱看晓雾”，朦朦胧胧，分辨不清其政治主张。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新民学会成员经过五四运动洗礼，思想与时俱进，相继发动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驱张”运动、自治运动，尔后又创办了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直至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建团、建党。他们追逐时代大潮，成为追赶潮流的弄潮儿。

1919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勤工俭学，第一次到北京，考察了“工读互助”新生活。回到长沙以后，他在岳麓山下试验过“新村主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消除劳心、劳力两个阶级的区别。毛泽东后来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白地说：“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文化、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1][25]}

不但中国早期革命者如此，就连苏维埃俄国也如此。在回顾俄罗斯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时，列宁深有感触地说：“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受了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理论。”^[2]这个描述，也是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寻找真理过程的生动写照。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

作者简介：曾长秋(1950-)，男，湖南浏阳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表示愿与东方邻国——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经上海《东方杂志》转载，中国人“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已是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对此评论：宣言体现了苏俄宪法“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中国人过去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应很好地“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3]，使自己的国家自强自立。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使毛泽东等一师学人开始确立新信仰。由于发动“驱张”运动，毛泽东于1920年初第二次到北京。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对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去北京大学找邓中夏和罗章龙，除了商量“驱张”和湖南“自治”的事宜，还请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情况。1936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谈话，说当年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还形容自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专挑喜爱的东西吃，其中三本书铭记在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以上三本书对毛泽东产生过很大影响，不仅在1936年对埃德加·斯诺讲过，而且在1941年9月对中央妇委和西北局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也讲过：“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4]可是，1920年初，这“三本书”尚未译出，虽然毛泽东读书的时间因记忆略有“提前”，却不否定其世界观转变的事实——他是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到马克思主义者行列来的。“到了1920年的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131]

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中国最早的先进知识分子，主要受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读过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20年4月，他离开北京赴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此时，陈独秀已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随员杨明斋会面，开始在上海筹组早期共产党组织。毛泽东在多次会晤陈独秀后写下回忆：“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甚至评价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1132-133]

1920年夏，毛泽东、彭璜、李思安等人在上海拜访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当面请教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彭璜写过《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于8月27日至30日在长沙《大公报》刊出。毛泽东此时写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小中国——从湖南做起》，也记载了他们一起拜访维经斯基的感受。毛泽东告别陈独秀时，谈了回湘的打算：为了做到“以俄为师”，先创办文化书社，再成立俄罗斯研究会，还准备组织湖南青年赴俄国勤工俭学（后来输送了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人去莫斯科）。陈独秀向毛泽东透露了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发起的信息，并把湖南列入组党的计划之中。

毛泽东于1920年7月7日回到长沙，一方面致力于创办文化书社来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另一方面为实行湖南自治而奔走呼号。然而湖南督军谭延闿在自治运动高涨之时便撕下了开明的伪装，自治运动的失败，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反思，随之抛弃了社会改良幻想，接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欢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列主义，积极寻找新路，踏踏实实地研究中国的问题。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向警予写信表示：“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必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5]

与此同时，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罗学瓚、萧三三人在法国已接触到世界大潮，眼界更加开阔，在蒙达尔纪会议上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尤其是蔡和森从报刊和工人运动中了解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写信回国，建议陈独秀、毛泽东成立中国共产党；^{[6]131,163}何叔衡、彭璜、易礼容、陈昌、夏曦等人则留在长沙，与毛泽东一道从事学生运动和民众斗争的实际工作。他们发行《新青年》和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逐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萌发了建党和革命的“初心”。在法国的李维汉、李立三、李富春等人经蔡和森的帮助，尤其是读了蔡和森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某些经典著作，也放弃了工读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新民学会的创始人萧子昇赴法勤工俭学以后在华法教育会任秘书，受吴稚晖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至深，尽管毛泽东、蔡和森做了许多工作，仍表示对社会只能进行“温和的改良”。

二、一师学人在湖南建党活动中的作用

新民学会自 1918 年成立以来，至今已超过百年历史。国内外对新民学会和湖南建党的研究，肇始于 1936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当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初，湖南省博物馆征集了许多涉及新民学会的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浏阳籍会员钟国陶献出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三册和两份《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最直接的资料是《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入了毛泽东 1912 年 6 月至 1920 年 11 月的文章 152 篇（其中正编 132 篇、副编 18 篇）。1980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民学会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些与新民学会和湖南建党相关的史料。国外学者直接研究新民学会与一师的著作只有一本，即由美籍华人刘力妍博士学位论文扩充的《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建（1903-1921）》。

以一师学人为主体的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共产主义者。根据湖南省党史研究院和长沙新民学会纪念馆的统计：参加新民学会的会员前后共 78 人，^[7]其中女会员 20 人（主要来自周南女校）；男会员主要来自一师，来自一师的男会员有 47 人（其中中学生 41 人、教师 6 人）。新民学会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者 37 人，其中蔡和森不仅最早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而且最早向中国传播了列宁的建党理论。毛泽东、何叔衡为中共一大代表，一大之前入党的一师还有李达、李中、李启汉、罗章龙等人。新民学会为中国革命牺牲者达 16 人，包括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郭亮、陈昌、夏曦、方维夏、张昆弟、罗学瓚、李启汉、陈子博、彭平之、傅昌钰、彭道良、谢南岭、罗宗翰等。以上除了向警予、罗章龙、李启汉、陈子博以外，均为一师学人。

[6]603-604

新民学会会员是湖南革命活动的中坚力量，从 1918 年至 1921 年，他们从长沙到北京、到上海，再从巴黎到蒙达尔尼到南洋，其足迹遍及五湖四海、万水千山。他们心中自有一团火，引领革命活动在艰难曲折中不断深入。他们响应和参加了五四运动、创办或改造了《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开展了“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也组织了湖南青年先后赴法、赴俄勤工俭学；他们通过创办文化书社和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逐步完成了湖南建团和建党的历史任务。然而，湖南建团、建党的地点并不是在发生在会员最多的一师校园内，而是发生在潮宗街 56 号的文化书社（租借“湘雅”医学院空置校区）。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批一师学人在五四运动之后陆续毕业了，活动重心移到了校外。

湖南先进知识分子的建党活动，分国内、国外两条线进行。1920 年 7 月 6 日到 10 日，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蒙达尔尼公学举行了 5 天会议，讨论蔡和森提出的“改造中国和世界”新宗旨，后来又讨论了成立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8]1921 年 1 月 1 日到 3 日，毛泽东与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新年会议”，热烈讨论之后进行表决：“赞成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起立者”占与会人数的 67%。我们可以把这“三天年会”看作湖南建党活动的“热身”，而“1921 年 5 月”则是湖南完成建党的“标志”。

在此之前，陈独秀确实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团、建党，李中也从上海寄来了一些建团、建党的文件和资料。1920 年下半年，毛泽东、何叔衡虽在酝酿成立党组织，却未成型，也没有确定组织的名称。1974 年，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九所”（内部宾馆）说过，湖南先有团、后有党。经过 1921 年元旦期间 3 天的讨论并未达成共识，毛泽东便邀部分人先建团。据当年 1 月 6 日毛泽东给彭瓚的信中通知他 1 月 13 日到文化书社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议。毛泽东 1933 年 5 月在江西中央苏区亲笔在自己的党证上填写“1921 年 5 月”入党。因此，1921 年 5 月初便有了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毛泽东、何叔衡参加中共一大回来，于 1921 年 10 月 10 日在长沙协操坪的树林里组建了中共湖南支部，支部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瓚、陈子博和彭平之 6 人（萧三回忆有彭平之，未提及贺民范，其他 5 人则公认）。新民学会在法国的会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罗学瓚、张昆弟等，一部分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被法国警察武装押送出法国，归国以后许多人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留下者也于 1922 年 6 月 18 日在巴黎参加了由周恩来、赵世炎创建的旅欧“少年共产党”。

中共一大以后，毛泽东深入学校、工厂、铁路、矿山，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到 1921 年冬，中共湖南支部迁入清水塘 22 号时，陆续加入者有贺民范、李立三、夏曦、郭亮、夏明翰、姜梦周、贺恕、李六如、杨开慧等十余人。毛泽东担任支部书记，

何叔衡为组织委员，易礼容为宣传委员。按照中共中央局的要求，凡有党员 30 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区执行委员会。1922 年 5 月 1 日，新成立的中共湘区委员会辖 3 个支部：即 1922 年 2 月成立的安源支部（李立三为书记）、湖南自修大学支部（姜梦周为书记）、湖南第一师范支部（夏曦为书记）。毛泽东亦两次去衡阳第三师范帮助建党。中共湘区区委除了有党员 30 多人之外，还能领导团员 60 多人，辖直属工会 2 个（粤汉铁路、安源路矿），联络工会 1 个（湖南劳工会）。至 1923 年 4 月，毛泽东调中央工作时，湖南已有 123 名党员、260 名团员，在长沙、浏阳、湘潭、湘乡、平江、常德、益阳、衡阳、衡山、耒阳、宜章、嘉禾等县市播下了共产党员的种子。毛泽东等一师学子是“播火人”，星星之火，已待燎原。

三、一师早期革命家对湖南党组织发展的贡献

古往今来，大凡成就一番事业的团体，都由一批对国家、社会、民众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物所维系。正如列宁的《怎么办？》一文所写：“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到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9]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学会会员的结合是一场寻找志同道合旅伴的旅行，是一场寻找“真同志”携手走上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路的发现之旅。毛泽东从上海返湘以后，成立文化书社销售《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等书籍以及《新青年》《劳动界》《时事新报》等报刊，在进步学生和青年工人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从中寻找“真同志”。他们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成员每逢星期天下午到文化书社阅览室读书，讨论时事政治，最终一部分人走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列中来了。湖南建团、建党的事，都发生在文化书社的阅览室内。

湖南在全国属于建党最早的省份之一，中共创建与两个学校息息相关：北有北大红楼，南有长沙一师。中共一大以前，散布在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共有 50 多名早期党员，其中湘籍会员约 20 位。他们之中除了湖南早期组织的 6 名党员以外，外地还有：在上海入党的李达（零陵人）、陈公培（长沙人）、周佛海（沅陵人）、林伯渠（临澧人）、李启汉（江华人）、李中（双峰人）、李季（平江人），在北京入党的邓中夏（宜章人）、何孟雄（炎陵人）、缪伯英（女，长沙人，何孟雄之妻）、罗章龙（浏阳人）、李梅羹（浏阳人）、朱务善（津市人）、吴汝铭（长沙人）。至于罗章龙回忆浏阳人在京读书的早期党员有宋天放和陈德荣，前者是否入党仍有待考证；后者虽已入党，有学者考证他是海南省文昌县人，不是湘籍早期党员。

湖南建党与新民学会密不可分，其成员主要来自一师。在 78 个会员中，属于一师的师生有 47 名。分别是：毛泽东（湘潭人）、蔡和森（双峰人）、何叔衡（宁乡人）、李维汉（长沙人）、罗学瓚（湘潭人）、陈昌（浏阳人）、郭亮（望城人）、夏曦（桃江人）、张昆弟（桃江人）、周世钊（宁乡人）、熊瑾玎（长沙人）、张国基（益阳人）、李中（双峰人）、萧子昇（湘乡人）、萧子暉（湘乡人）、贺果（邵东人）、萧青野（湘乡人）、罗宗翰（安化人）、刘明俨（安化人）、陈书农（长沙人）、陈绍休（浏阳人）、彭道良（浏阳人）、邹彝鼎（湘阴人）、邹蕴真（汉寿人）、周名弟（湘潭人）、叶兆楨（益阳人）、傅昌钰（浏阳人）、欧阳泽（益阳人）、谢南岭（宁乡人）、夏石泉（武冈人）、曾以鲁（武冈人）、熊光楚（湘乡人）、蒋竹如（湘潭人）、张怀（长沙人）、刘修秩（湘潭人）、萧道五（湘潭人）、张超（湘乡人）、钟秀（湘阴人）、喻恒（平江人）、姜慧宇（宁乡人）、易阅灰（长沙人）。此外，谢觉哉（宁乡人）、方维夏（平江人）、匡互生（邵阳人）、钟国陶（浏阳人）、李云杭（湘阴人）、熊梦非（湘阴人）在五卅时期皆为一师或一师附小的教员。属于一师但没有加入新民学会的著名党员有：任弼时、李达、徐特立、袁国平等；不属于一师而成为新民学会会员的名人有：罗章龙、李启汉、彭璜、易礼容、陈子博、彭平之、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刘清扬、许文煊、陶毅、劳君展、魏璧、任培道、李思安、周敦祥、贺延祐、熊季光、熊淑彬、李振翩……从名单看，可谓群英荟萃。印证了岳麓书院大门旁对联所写“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歌颂了湖湘子弟“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10]。

湖南勤工俭学和湖南建团建党的实践活动，主要由一师学人推动。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六个地方早期党组织”中，中共一大之后发展的党员以湖南人数最多、素质最好，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最大。罗章龙当年写诗称赞：“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1988 年，蔡畅为新民学会纪念馆题词：“毛蔡寄庐流芳千载，新民学会建党先声。”新民学会发出了湖南建党的先声，78 名会员先后加入共产党者 37 人。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成立的“工学世界社”（开始称“勤工俭学励进会”，后来部分成员组建了“少年共产党”），实际上是新民学会的海外分支。其中产生了如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李富春，中央军

委委员颜昌颐、欧阳钦，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林蔚、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李慰农、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开国少将唐铮等人物。中共早期党员刘清扬则是新民学会在法国发展的会员，她与丈夫张申府一起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以一师学人为主体的新民学会会员中，不但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早期共产党人，还有一批学有所成的专业人才。如：师从居里夫人的物理学家劳君展，旅美医学家李振翩，中法文化交流先行者萧子昇，《国际歌》翻译者萧三和艺术家曾以鲁，文史馆员李思安、邹蕴真，著名记者唐耀章、黄醒，知名教授魏璧、陶毅、周敦祥、任培道、吴家瑛、杨润余、陈书农，华侨教育家张国基，被毛泽东称赞的教育家周世钊、张怀，被巴金称为“有理想、有干劲”的教育家匡互生……群星灿烂。他们投身于科技救国、教育救国或实业救国，为近现代中国的科教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四、近代以来一师人才辈出的原因

湖南近现代人才辈出，涌现的人才群体与一师及其前身城南书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湖南近现代有三个人才群：湘军和洋务运动人才群，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人才群，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才群。^[11]尤其是第三个人才群体，其成员大部分来自一师。其中，毛泽东和蔡和森经常一起谈论天下大事，切磋学问，情同手足。他们的恩师杨昌济对两人评价甚高，去世之前写信给章士钊：“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12]他们不负导师“欲栽大木柱长天”的期望，成为了近现代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的成长经历，可谓——学校铺路，老师引路，学友同路。

“伟人长于此，必有其原因”。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滋养和人文环境的陶冶，湖湘大地尤其是湖湘文化哺育了近现代湖南人的革命性。湖南人的革命性，铸造了“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湖南精神。在他们身上一般具有三气：刚气、霸气和灵气。湖南人的性格，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特质。湖湘文化特质的形成，历经先秦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化的洗练，后来才有“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的美誉。众所周知，湖南人“认死理”——只要认准目标，就会一条路走到底！敢于冲破藩篱、义无反顾的精神气质，造就了近现代的湖南人才群体。考察湘人的言行，就会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刚烈和韧性，那股蛮力和倔劲。可是，湖南这块热土开发得比较晚。清朝中叶以前湘人出头者屈指可数，只是到近代才有活力和生机。自从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以来，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学风，十分注重引导人们走向实政、实用、实行的经邦济世之路。贵实践而耻空谈，主张通家国天下治安之计，方能够“出为良臣，处为良士，经邦济世，治军治国”，做出一番事业来。

湖南人在近现代为何突然“发力”？单纯从地理位置上解读尚缺乏说服力。湖南人才迅速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离不开教育发力，其中一师功不可没。作为湖南这块热土上的人才培育基地，一师的前身是创办于南宋被誉为湖湘文脉渊源的城南书院。当年，国家落后挨打、民不聊生、民智蒙昧的状况，迫切需要来一场“大变革”。可是，国内尚缺与变革相适应的经世之才，急需兴学育才。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把师范教育推上了历史舞台，一师秉承其固有文化底蕴，切入时代大势，成为了湖南兴学育才的基地。毛泽东等人的建党初心或革命初心，受一师的熏陶。

在“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摇篮，一师早期学生多来自湖南农村，是一群乡村知识分子、自耕农和小商人的子弟（当时不招女生，现在女生多于男生）。他们对中国的落后状况、社会矛盾有切身体验，怀着强烈的变革社会愿望，脱颖而出。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陈昌、李维汉、任弼时、夏曦、郭亮、张昆弟、罗学瓚……是这群学子的佼佼者。他们修学储能，为了锤炼意志，“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为了探求真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通过读“无字之书”（调查研究）确定人民情怀、成立新民学会发出了“建党先声”。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学生“出类拔萃”离不开教师“阵营整齐”。一师有一批师德高尚、学问扛鼎的师资，如孔昭绶、易培基、杨昌济、黎锦熙、杨树达、方维夏、徐特立等，此后又有李达、匡互生、田汉等名师。一流的师资，保障了兴学育才的质量。当年一师的教育传统和教学理念——“德智体”三育并重，德育为先；践行民本主义，强化爱国教育，成为兴学育才的又一原因。正是一师等学校积极参与了诸多现代新观念在20世纪前期的传播，从而“促进了激进主义的兴起，为精英人士中新的政治运动提供了背景和动力”^[13]。

如果说“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也可以说“半部中共党史由湘人写就”。人们常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生

于斯——湖南湘潭的韶山冲，长于斯——湖南第一师范，实际上是“韶山出了个毛泽东”或“一师出了个毛泽东”。韶山是毛泽东出生的地方，一师则是他求学和世界观初步形成的地方。1950年，毛泽东与周世钊谈话，盛赞母校对自己的培育。毛泽东在一师求学和工作了8年，与杨开慧结婚也在天鹅塘青山祠一师教工宿舍，因此对母校感情笃深。他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14]试问，中国有哪所学校得到过如此褒奖！此外，李维汉说过：“一师的校史，既是一部教育史，又是一部革命史。”^[15]谢觉哉也说：“湖南新文化之花，完全在第一师范。”^{[6]169}

从上可知，以一师优秀文化为源头、以一师为载体、以一师学人为主轴，通过湖南建团建党的革命实践，揭示出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在五卅时期，一师学人形成了“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务实学风，“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谦逊态度，“忧国忧民、投身革命”的爱国情怀，“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创业作风，“信仰坚定、纪律过硬”的党性修养，“理想高尚、砥砺成才”的育人精神，“聚力成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救国救民、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投身到中国革命事业中。新民学会当年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今天形成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富强、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一脉相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已从起步时的50多人，发展到现在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460多万个党的基层组织，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执政党。如果说一师是毛泽东等人“建党初心”萌发之地，那么南湖红船则开始了中国共产党起航。上海造船，南湖起航，党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继续奋斗正当其时。今天，弘扬建党精神，就要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前进力量，从而更好地肩负起自己责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
- [2]中央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6.
- [3]五一劳动节纪念号[J].新青年,1920(6).
- [4]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22.
- [5]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548.
- [6]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7]夏远生.致敬!那一代热血青年——写在新民学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N].湖南日报,2018-04-10(08).
- [8]蔡和森.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0-51
- [9]列宁.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2.
- [10]王友胜,朱子良.论杨度《湖南少年歌》的家国情怀[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8(8):43-45.
- [11]郭辉东.湖南近现代人才群起及其原因[J].湘潮,1992(4):4-7.
- [12]易永卿.蔡和森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探索[J].求索,2004(12).

[13]刘力妍. 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建(1903-1921) [M]. 王毅，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3-4.

[14]周世钊. 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 [J]. 新观察，1951 (2).

[15]本书编写组.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